

# 中国企业国际化

## ——研究进展与未来研究方向\*

□ 马田园 张 闯

领域编辑推荐语：

“本文选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是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一次较好的系统回顾和展望。”

——马旭飞

**摘 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现象引发了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目前该领域研究内容呈现发散状态，仍处于理论构建的早期阶段。通过对310篇中英文文献的详细回顾，本文从国际化动因、战略和结果三个方面，全面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分析框架，同时依据现有文献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正式制度和文化在该主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重点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纽带，中国国内区域之间正式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政治战略，企业国际化的社会绩效，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等，将其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选题，以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中国；企业；国际化；文献回顾

## 一、引言

广义的企业国际化是指“企业融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过程”，包括企业融入海外市场的所有活动，如出口、特许经营、战略联盟及对外直接投资等（Mathews, 2006）。

---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和网络化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营销战略研究”（71532011）的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外审专家、领域编辑主编的宝贵意见和专业建议，感谢英国诺丁汉大学王成岐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单宇副教授在论文修改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而从狭义上讲,企业国际化仅指企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活动(Hitt et al., 1997)。为了聚焦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问题,本文参照Luo和Tung(2007)采用狭义的企业国际化定义,将中国企业国际化界定为由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个或多个国家对跨国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并从事价值增值活动的经营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持续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国际化战略。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1369.1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0.4%和6.4%,分别列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自2003年中国有关权威部门发布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已连续八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商务部,2020)。

中国企业的快速国际化现象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综述性文献参见Alon et al., 2018; Deng, 2012; Haasis & Liefner, 2019)。传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所具备的“垄断竞争优势”或“所有权优势”是其跨国经营的必备条件,而作为后来者,这些优势正是中国跨国企业所缺乏的(Bonaglia et al., 2007; Luo & Tung, 2007),而中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特性,增加了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与文化、政治以及宗教相关联的“外来者劣势”,也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面临着巨大挑战(张述存,2017)。缺少“所有权优势”和独特的母国特征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对经典国际化理论提出了挑战(Buckley et al., 2018; Child & Rodrigues, 2005),也使其在国际化路径和战略选择上与西方发达国家

跨国企业存在较大差异。正因为如此,学界对现有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等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独特现象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理论,如OLI(ownership, location, internalization)框架,仍然适用于解释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Narula, 2012)。Liu等(2005)发现基于Dunning(1981)的IDP(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方法,而无须依靠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就可以解释中国企业近一半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独特性,需建构新理论进行解释(Buckley et al., 2018)。例如,Mathews(2006)构建了LLL(linkage-leverage-learning)理论框架,提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依靠与外国公司的合作或国际联系来利用其资源,并学习如何在全球市场上竞争。Lu等(2017)将Mathews(2006)的LLL模型扩展为IOL<sup>3</sup>(inward linkages-outward linkages-leverage-learning)的理论框架,强调内向投资与外向投资之间的关联关系,并认为母国效应对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重要解释。Luo和Tung(2007)提出了一个跳板视角(springboard perspective),指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获取战略资源与能力,以克服在全球竞争中的后发劣势。第三种观点承认现有理论在解释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独特性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认为仍需修正和扩展(Cuervo-Cazurra, 2012; Deng, 2013; Lu et al., 2014; Kang & Jiang, 2012)。Child和Rodrigues(2005)指出,与传统对外投资观点相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是为了利用其竞争优势,而是为了弥补其竞争劣势。虽然学界并未就是否需要建构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企业

国际化达成一致，但中国企业国际化现象呈现出的独特特点，为检验、扩展及创新现有理论提供了独特机会。为了更好地推动该主题的研究，有必要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以明确现有研究进展和存在的理论缺口，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虽然近年来一些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相关的综述性文献（黄胜等，2015；Alon et al., 2018；Deng, 2012；Haasis & Liefner, 2019；Luo & Zhang, 2016）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该主题研究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第一，多数综述性文献的研究主题聚焦于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探讨它们的一般性特征（黄胜等，2015；Jormanainen & Koveshnikov, 2012；Luo & Zhang, 2016），这些文献只是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主体之一，因此无法突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动因、战略乃至绩效方面的若干独特性。第二，少数将主题聚焦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综述性文献在研究框架的设定上尚无法完整、及时地反映研究的进展。如 Alon 等（2018）的综述仅关注了检验传统 FDI 理论、国际化选址、进入模式和国际化动机与驱动因素四个主题。Deng（2012）提出了国际化决定因素—过程—结果这一较为完整的综述理论框架，并由此评述了关于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文献。但近十年来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相关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不断涌现，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数字化平台企业的快速国际化，人工智能与 5G 等新技术对国际化的影响等，该框架未能涵盖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因为这些新问题和新现象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战略乃至绩效，所以有必要对该主题的研究进展进行更

新与扩展。Haasis 和 Liefner（2019）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快速成长的研究领域，他们发现 2011~2017 年 Deng（2012）所指出的多数问题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但他们的工作局限于 Deng（2012）的综述框架，从而不能充分地展现 2010 年以后该领域研究进展的全貌。第三，目前聚焦于该主题的综述性文献均为英文文献，尚缺乏将中文文献纳入综述框架的研究，无法充分反映中国本土学者（从本土视角）对该研究主题的研究贡献。显然，中国学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力量，而要充分、完整地反映研究的进展，必须将中文文献纳入分析范畴。基于现有综述性文献的不足，本文将对该主题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 二、文献的选取与文献基本情况分析

### （一）文献的选取

为了更好地反映该主题研究现状，本文按照以下思路确定期刊范围和文献的索检与分析程序。英文期刊范围的确定参照 Luo 等（2019）的方法，本文首先将管理类和 IB 领域的顶级期刊纳入文献检索范围，然后再参照以往综述研究中期刊遴选结果（Deng, 2012；Luo & Zhang, 2016），将除顶级期刊之外的管理类主流期刊补充到期刊索检范围中，以确保不遗漏重要的主流期刊。其次，中文学术期刊的选取重点考虑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核心期刊目录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 A/B 类期刊目

录，并将收录在会议论文集集中的论文和学位论文排除在外。最后，在文献检索与回顾过程中，根据检索到的文献引文对期刊进行扩充，以确保不遗漏重要的学术期刊，最终共有 32 本期刊被纳入框架内。

文献检索期刊范围确定后，我们在主要学术文献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检索。其中，英文文献检索以 EBSCO 数据库为主，辅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文文献检索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主。参照现有综述性文献（Deng, 2012; Luo & Zhang, 2016）设定的时间框架，我们将检索的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1 年至 2019 年 5 月。在关键词选取上，参照之前关于该主题的综述文献（Alon et al., 2018; Deng, 2012），使用如“国际扩张”（international expans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国并购”（cross - 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对外投资”（outbound investment）等关键词，并将以上关键词与“China”和“Chinese”两个

关键词通过布尔运算符组合在一起。为确保不遗漏关键文献，我们采取了以下两种措施：第一，对于重要期刊（如 UTD24 种顶级管理学期刊）进行逐卷、逐期的手动检索；第二，根据检索到的重要综述性文献和经典文献的引用文献进行补充检索。按照以上程序，本文共检索到英文文献 290 篇、中文文献 139 篇。针对检索到的文献，本研究团队的两名博士生通过阅读论文摘要、引言等内容进行筛选和甄别。根据前面本文对企业国际化的定义，我们只研究中国企业与海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化的论文，而将研究出口、特许经营等形式国际化的论文排除在外。此外，在阅读与回顾相关文献过程中，我们对顶级期刊中引用的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补充检索。

## （二）文献基本情况分析

通过系统而严谨的筛选，最终共有 310 篇文献被纳入了综述框架。其中英文文献 208 篇，中文文献 102 篇，文献基本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文献分布

英文期刊名称	论文数	中文期刊名称	论文数
<i>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i>	43	《管理世界》	15
<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i>	34	《科学学研究》	12
<i>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i>	24	《南开管理评论》	11
<i>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i>	23	《管理评论》	11
<i>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i>	19	《管理学季刊》	7
<i>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i>	16	《中国软科学》	7
<i>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i>	14	《世界经济》	6
<i>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i>	10	《中国工业经济》	6
<i>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i>	9	《预测》	5
<i>Global Strategy Journal</i>	8	《管理科学》	4
<i>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i>	4	《经济研究》	3

续表

英文期刊名称	论文数	中文期刊名称	论文数
<i>Harvard Business Review</i>	3	《经济管理》	3
<i>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i>	1	《管理科学学报》	3
总计	208	《金融研究》	2
		《科研管理》	2
		其他	5
		总计	102

注：“其他”指仅发表了1篇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文章的期刊，包括《财贸经济》《世界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该主题研究文献发表的时间来看，2006年以前，中文和英文文献分别仅有19篇和12篇，而在2007年以后开始增加，其中2007~2013年中文文献27篇、英文文献79篇；2014~2019年中文文献56篇、英文文献117篇。研究文献的上述时间分布以2007年为基本分界线，该时间点以后研究文献快速增长（见图1）。这可能与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在2007年5月出版的关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化问

题的专刊有关<sup>①</sup>，该专刊出版对此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三、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为整合现有研究，我们按照企业国际化动因—战略—结果（前因—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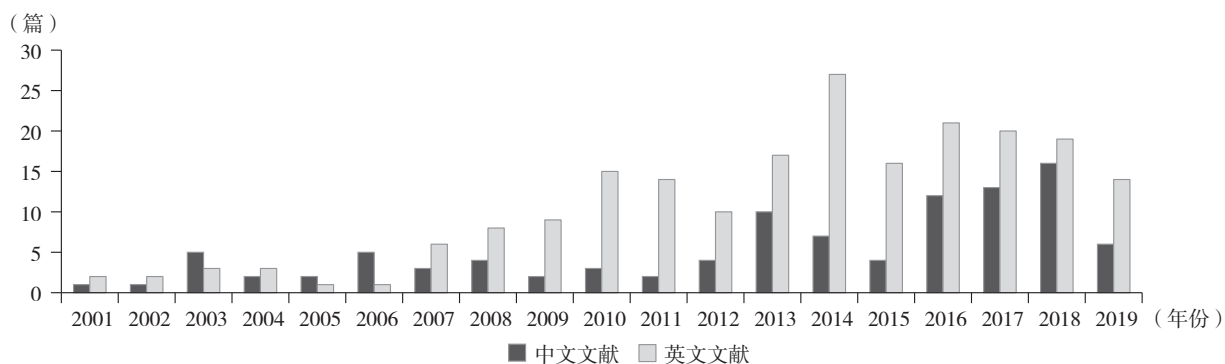


图1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分布整理。

<sup>①</sup> 近年来一些期刊针对中国企业或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问题发表了特刊或专题，如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2014);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1);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As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 (一) 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

Dunning (1998) 提出企业跨国经营有四种动因: 寻求自然资源——获取并确保企业所需的原材料或能源能够持续供应; 寻求市场——维持现有市场或开拓新市场; 寻求效率——获取廉价投入要素及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寻求战略资产——获得企业长远战略发展所需的关键无形资产。学界认为 Dunning (1998) 的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动因, 现有研究认为寻求市场和寻求战略资产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Deng, 2009; Wei, 2010), 而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缺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国际化活动弥补这一不足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独特的动因之一 (Child & Rodrigues, 2005; Cui & Jiang, 2010)。

#### 1. 寻求自然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企业对重要自然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铜等的依赖程度, 虽然中国自然资源丰富, 但人均可获得水平很低 (Deng, 2004)。Buckley 等 (2008) 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中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制造业, 这与中国自然资源短缺有着密切关系, 寻求自然资源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 (Buckley et al., 2007)。中国在非洲 (也包括中亚国家、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 的投资正是这一动因驱动的 (Wang et al., 2012)。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一方面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在国内的生产成本, 缓解国内市场对海外资源的需求压力 (Deng, 2004), 另一方面使企业在海外进行自然资源开发时, 可以将国内员工派遣到海外,

取得成本优势 (Cui & Jiang, 2010)。

#### 2. 寻求市场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利用其所有权优势的过程 (Buckley et al., 2008)。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 由于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增加, 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跌, 迫使中国企业寻求新的国际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 以应对它们在国内市场利润不断下降的问题 (Deng, 2009; Kang & Jiang, 2012)。另一方面, 企业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也会驱使其进入国际市场寻求发展空间 (Child & Rodrigues, 2005; Yang et al., 2009), 如研究发现面临大型国有企业对国内某些领域垄断的非国有企业, 会选择进入国外市场以寻求发展空间 (Luo et al., 2010)。

#### 3. 寻求效率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企业拥有低成本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它们跨国经营的目的不是获取廉价劳动力以降低成本, 因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太可能是寻求效率驱动的 (Buckley et al., 2008; Deng, 2004; Kang & Jiang, 2012)。但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以制鞋和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向越南、泰国、老挝等劳动力充裕且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任晓燕和杨水利, 2016), 使企业不仅能够降低成本, 而且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 (吴先明和胡翠平, 2015)。受寻求效率动因的驱使, 中国跨国公司也更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和需求不断增长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Buckley et al., 2007; Deng, 2009; Rugman et al., 2016)。

#### 4. 寻求战略资产

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中国跨国企业缺乏传统的所有权优势，它们的跨国投资活动可能不会被利用所有权优势的动因驱动（Cuervo-Cazurra, 2012; Liu et al., 2005）。作为后来者，中国跨国企业似乎走在了一条不同的国际化轨道上（Cui & Jiang, 2010），寻求战略资产是驱动它们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Rui & Yip, 2008; Wei, 2010）。它们通过寻求海外战略资产的方式实现国际化，以弥补竞争劣势（许晖等，2008; Child & Rodrigues, 2005; Deng, 2009）、追赶全球巨头（Deng, 2007）。研究发现，中国逆向进入发达国家主要为寻求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分销渠道、管理技能等战略资源（Deng, 2009），这些资源在国内基本上无法获得，但对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至关重要（Buckley et al., 2008）。

#### 5. 母国制度动因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规则（North, 1990）。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嵌入在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影响着企业战略行为的选择（Peng, 2002）。先前的研究已表明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主要是由市场“推动”的，它们的业务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运作的（Buckley et al., 2018; Deng, 2004）。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制度嵌入”的，而不仅是企业的战略选择（Child & Rodrigues, 2005; Buckley et al., 2007）。这方面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制度压力论，认为对外投资不仅由经济因素如利润最大化驱使，而且也是中国企业服从母国强制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的结果，因此从本质上说，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平衡这两种压力的结果（Wang et al., 2012）。第二种观点是制度支持论，认为政府支持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Buckley et al., 2007; Cui & Jiang, 2012; Deng, 2007; Wang et al., 2012）。政府制定的相关投资政策在制度上弥补了中国跨国企业的竞争劣势和组织缺陷，增强了其所有权优势（Wang et al., 2012），从而更好地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展开竞争（Lu et al., 2014; Luo et al., 2010）。此外，在政治上与母国政府的隶属关系也是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因（Cui & Jiang, 2012）。研究发现，企业中国有股权为企业提供了一条获得政府资源的途径，随着国有股权的增加，企业能从政府获取资源的程度也越高，也更不容易受海外投资压力的影响（Xia et al., 2014）。第三种观点是制度逃离论，认为由于中国的制度发育尚不完善，企业在受益于母国特定制度优势的同时，其国际化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母国制度环境的制约（Wei, 2010），企业因此会选择“逃离”到更高效和更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国际化经营，以规避国内的制度弊端（Child & Rodrigues, 2005; Deng, 2009; Wei, 2010）。综合以上三种观点，在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时，如果不考虑其独特的母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将无法对其国际化的动因做出完整的解释（Child & Rodrigues, 2005; Kang & Jiang, 2012）。

####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

Melin（1992）认为，国际化本身是企业正在经历的一种战略过程，该过程决定了国际企业在（地理）范围、经营理念、行为导向、组织原则、主导价值等方面的持续发展和变化。

现有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主要包括区位选择、进入模式和建立模式,以及内向国际化等方面。

### 1. 区位选择

前述 Dunning (1998) 提出企业跨国经营的四种动因,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相关 (Kang & Jiang, 2012)。研究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中国企业寻求资源、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任晓燕和杨水利, 2016; Buckley et al., 2007; Cui & Jiang, 2010), 而以寻求战略资产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进入发达国家 (Deng, 2009)。

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选择区位的关键要素,现有研究也多采用制度理论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Cui & Jiang, 2012; Quer et al., 2012)。研究认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 (陈岩等, 2014), 而较高的政治风险则抑制了中国企业的投资 (张建红和周朝鸿, 2010)。但 Buckley 等 (2007) 却发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另外,东道国对产业的保护以及限制性监管政策会抑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张建红和周朝鸿, 2010; Cui & Jiang, 2009), 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常被怀疑是具有政治目的,而受到东道国政府的限制 (李诗和吴超鹏, 2016; Cui & Jiang, 2012), 因此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与中国的正式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陈岩等, 2014; Li et al., 2016; Quer et al.,

2012)。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经营是风险规避型的,倾向于选择制度距离较近的国家进行投资 (方慧和赵甜, 2017)。Ghosh 等 (2017) 的研究发现,孔子学院的建立和运作通过降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能显著增加中国企业在孔子学院所在国的直接投资,而且以上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偏好通过氏族和地缘网络而不是依赖法律或其他正式制度支持进行交易,因而它们向海外扩张可能与海外基于种族的社交网络有关 (Deng, 2004; Child & Rodrigues, 2005)。Gao 等 (2013) 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走向海外 (海外华人) 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华人之间强大的经济与网络联系构成了企业特有的优势,弥补了其后来者劣势,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决策 (Buckley et al., 2007)。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多数研究使用了官方 (如商务部等) 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这些数据只考虑了企业进入的第一个目标国家/地区,但现实的情况是跨国企业常以这些目标国家/地区 (如中国香港或卢森堡) 为中介地来进入最终的目标投资地点 (Alon et al., 2018; Buckley et al., 2018)。因此,对企业国际化最终目的地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进行更加准确的解释。

### 2. 进入模式和建立模式

以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根据企业持有股权的不同,可以选择建立合资企业和建立独资企业 (Cui & Jiang, 2009)。与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相关的国际化战略是企业东道国的建立模式,

主要包括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种 (Brouthers & Hennart, 2007; Dikova & Van Witteloostuijn, 2007)。参照 Brouthers 和 Hennart (2007) 的观点, 本文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和企业建立模式视为两个相关但独立的企业决策展开论述。

在进入模式方面, 学者们重点考察了进入模式的决定因素。Cui 和 Jiang (2009) 采用战略意图和战略契合度的分析框架, 构建了一个战略行为视角, 以确定企业对全资或合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当行业竞争激烈时, 企业会选择全资的方式进入, 而当中国企业增长高于东道国企业增长时, 合资进入则成为首选。一些研究还发现, 当企业以寻求战略资产为目标进入东道国时, 它们倾向于选择全资进入 (Buckley et al., 2008; Cui & Jiang, 2010)。因为全资进入模式通常具有高水平的控制, 可以确保总部与国外子公司之间或整个子公司之间的高水平协调 (Cui & Jiang, 2009)。考虑到制度环境的重要性, 现有研究关注了东道国制度、制度距离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蒋冠宏, 2017; Cui & Jiang, 2010)。相对于全资而言, 母国与东道国的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越大, 中国企业越偏好于选择合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陈怀超等, 2014), 以规避东道国政府限制的影响, 并获得制度合法性 (Lin, 2010)。

在建立模式方面, 并购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式之一, 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在并购动因和决定因素方面, 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常选择并购的方式 (Deng, 2004; Li et al., 2016; Rui & Yip, 2008), 拥有丰富国际化经验的企业也多

采用这种方式进入东道国 (林莎等, 2014)。Cui 和 Jiang (2009) 认为中国企业的并购更注重战略意图而非战略契合, 希望通过海外并购加速国际化。此外, 政府支持也是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Child & Rodrigues, 2005; Cui & Jiang, 2012), 企业的跨国并购决策受到了各级政府政策的影响, 如激励政策 (低成本贷款、退税等) 或者行政审批限制 (Deng, 2009; Luo et al., 2010)。同样, 东道国制度要素也会影响中国企业并购, 较大的制度距离使并购企业难以正确解读东道国政治环境、并购程序以及经济规则等要求, 更容易受到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抵制 (贾镜渝和李文, 2016), 因而并购所在产业的政治敏感性越强, 成功率越低 (李诗和吴超鹏, 2016)。关于并购结果或绩效方面的研究, 有学者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能够获得关键战略能力, 弥补竞争劣势 (Li et al., 2016; Rui & Yip, 2008)。

除并购进入外, 企业也可以选择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与并购相比, 绿地投资更适合解释企业国际化区位决策, 因为这些投资多受东道国特征驱动, 而并购区位决策则多是目标企业的企业层面特征驱动的 (De Beule et al., 2018)。蒋冠宏 (2017)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和资源对中国企业进入策略影响的研究发现, 在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好或制度差异大的沿线国家, “可转移优势” (如技术和研发) 明显的企业倾向于以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制度差异大的沿线国家。此外, 对于来自制度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但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更有可能采用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 以减少其对母国制度环境相关能力的依赖 (Liu &

Yu, 2018)。

### 3. 内向国际化

内向国际化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指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外资企业的交易活动 (Buckley et al., 2002)。中国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得益于在内向国际化活动中与外企的合作 (Li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0), 通过合作, 中国企业能够获得关键技术和技能, 积累国际化经验 (Buckley et al., 2007; Luo & Tung, 2007; Zhang et al., 2014), 促进其外向国际化。但内向国际化也可能导致对外企的过度依赖, 使企业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进而被外企兼并或排挤退出市场 (吴冰等, 2018), 所以反而不利于其外向国际化。除此之外, 拥有特定技术优势的外企对华直接投资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 会降低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进行技术寻求投资的倾向 (Li et al., 2012)。而由于外向国际化固有的风险, 管理者害怕失去从内向国际化中获得的收益, 也会阻碍企业的外向国际化活动 (Li et al., 2017)。

### (三) 中国企业国际化结果

企业国际化活动和企业 (经济) 绩效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中广泛讨论的主题,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与对经济绩效关注的热度相比, 学界对企业非经济绩效结果的关注则相对不足。少数学者探讨了国际化对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的影响, 对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及扩展该研究主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1. 经济绩效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动因中交织着太多的政治和制度因素 (Kang & Jiang, 2012), 因而在

评估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结果时, 常常不能完全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指标。例如, 如果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目标是将关键资产和技术转移回国内, 那么它们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则是次要的 (Buckley et al., 2018)。而国有企业可能并不追求短期市场目标, 它们可能更关注政府倡导的长期发展规划 (Buckley et al., 2007; Child & Rodrigues, 2005)。此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平衡竞争压力和制度压力的结果 (Wang et al., 2012), 不宜用利润最大化之类的经济指标来评价。另外, 指标选取和测量方式的多样性, 也使关于企业国际化经济绩效结果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Bausch 和 Krist (2007) 认为, 由于测量方式以及现行国际化理论的不充分, 导致现有研究对国际化-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检验结果仍处于模糊状态。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 线性正相关、“U”形、倒“U”形、水平“S”形、“N”形关系, 甚至是不相关 (陈立敏等, 2016; 吴晓波和周浩军, 2011; Zhong et al., 2013), 这可能与不同研究采用的测量方式存在差异有关。除此之外, 因为国际化对绩效既有正向影响, 也有负向影响 (Bausch & Krist, 2007), 所以正负关系都可能存在数据中, 依托某一样本以及不同的时间段的研究可能只捕捉到国际化与其绩效结果关系曲线的某一部分, 导致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影响国际化绩效的因素方面, 现有研究证实了企业的国际化经验、高管团队、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绩效的重要因素 (李梅和余天骄, 2016; 许晖和邹慧敏, 2010; Zhong et al., 2013)。例如, 董临萍和宋渊洋

(2017)认为企业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高管团队对企业国际化的关注程度越高,企业的国际化绩效就越好。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了阻碍企业国际化绩效增长的制度要素,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合法性缺失、文化距离等因素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许晖和邹慧敏,2010;Li et al.,2016)。但这种负面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制度障碍,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同构而获得合法性(Wang et al.,2012),以改善国际化绩效(陈立敏等,2016)。

## 2.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创新

中国企业能否从海外投资中获益,从而提高知识吸收能力,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贾镜渝和李文(2016)认为,受企业吸收能力限制,中国企业无法完全吸收由并购获取的先进技术,因此他们提出企业的技术寻求(战略资产)动因会削弱知识距离对并购成功率的正向作用。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Li et al.,2016),但Wu和Voss(2015)认为企业对新事物的学习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组织的僵化和惰性。而企业在东道国成功经营后,能否将吸收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上,并影响着企业进一步的国际化战略选择(Haasis & Liefner,2019)。研究发现,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的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而这种正向影响对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作用更强(Wu et al.,2016)。随着企业研发国际化广度的增加和组织学习收益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正向影响也会增

强(李梅和卢程,2019)。此外,Zhang等(2016)发现,政治联系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强的能力,可以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在发达市场为其创新产品建立合法性。

## 四、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本文对310篇文献的回顾表明,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文献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2007年*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专刊发表之后,这种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虽然学界关于是否需要建构基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存在争论,但快速增长的研究文献一方面表明学界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高度关注,使之成为国际商务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领域;另一方面也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存在诸多不同,尤其是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与战略,以及该过程中母国政府的作用等方面是现有企业国际化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的(Cuervo-Cazurra et al.,2018;Luo & Tung,2007),这为扩展及创新企业国际化理论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采用国际化动因—战略—结果这一框架,对该主题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评价,并根据现有研究的不足,构建了一个以(国内)正式制度与文化两个要素为核心的研究分析框架(见图2)。此框架的上半部分实线框图展现的内容为现有研究已经关注的要素,下半部分虚线框图展现的内容为目前研究不足、需要未来研究予以进一步关注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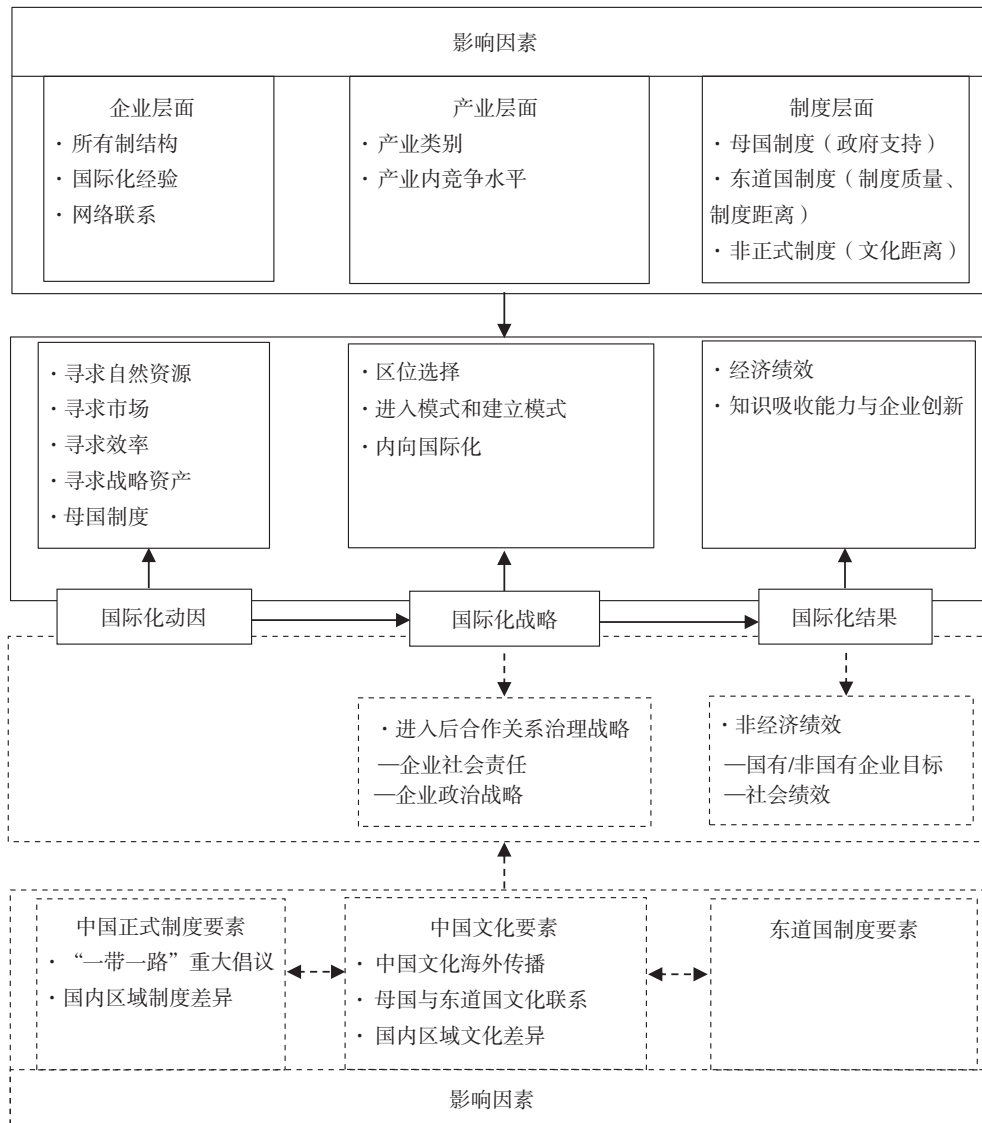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分析框架

注：图中实线部分为现有研究已经关注的；虚线部分为未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参见 Alon 等（2018）和 Deng（2012）的综述性文献。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呈现的某些独特性，为检验一般的国际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情景（Alon et al., 2018），同时也为扩展及创新现有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尽管学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的兴趣不断提升，但该主

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具体而言，母国制度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方面，其作用大多被间接地概念化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式制度距离或文化距离（Cuevo-Cazurra et al., 2018）。然而，随

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认为母国制度（正式和非正式）要素的影响是使之区别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Cuervo-Cazurra, 2012; Cuervo-Cazurra et al., 2018; Hernandez & Guillén, 2018），而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显然需要对中国的制度要素给予更多关注（Buckley et al., 2018; Hernandez & Guillén, 2018）。结合前述分析，下面我们首先主要围绕中国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提出几个未来研究的方向。为区分和突出中国文化要素的作用，我们将分别讨论正式制度要素和文化要素的影响。其次，我们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治理、国际化结果，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问题的未来研究建议。

### （一）深化中国国内正式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

#### 1. 关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是驱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正式制度要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之后会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Li et al., 2019）。自2013年被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其影响范围日益扩大。截至2021年1月底，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且潜力

巨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在沿线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近1.1万家，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173.1亿美元；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近9.3万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9.4%（国家统计局，2020）。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强大政策推力。

相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而言，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更加综合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地缘政策，被认为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努力（Van Hoorn & Maseland, 2016），致力于塑造一个对中国和中国跨国公司更为有利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Huang et al., 2017）。另一方面，作为一项正在发挥越来越广泛和深远影响力的国际合作框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机制在性质上区别于现有研究关注的双边国际外交关系（Li et al., 2019）和双边贸易协定（宗芳宇等，2012），以及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区域多边国际合作制度安排（Reed et al., 2016），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所以，现有企业国际化的概念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Buckley et al., 2018），从而需要给予该倡议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及其

结果的影响机制更加充分的关注 (Li et al., 2019)。<sup>①</sup>

可见, 作为一项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政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必将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东道国选择、进入方式与建立模式等国际化战略产生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正式制度, 中国政府通过规划各个省级行政单位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定位与作用, 以及配套相应的补贴、激励与指导政策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产业与项目进行引导 (Li et al., 2019), 从而形成了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相互补充的一项政策安排。国际方面,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 中国与沿线国家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地缘外交网络, 这种比较紧密的国际合作无疑将会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协作, 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沿线东道国获得合法性, 降低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相关的风险与成本 (Kandogan & Hiller, 2018; Li et al., 2019)。

综合以上讨论, 我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首先,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结果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关注: 第

一, 相较于“走出去”战略而言, “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推力在东道国、目标产业、进入战略等方面都更加具有指向性, 因而首先需要关注这种指向性如何塑造了企业的区位选择、进入和建立模式以及进入后合作关系治理的国际化战略选择。第二, 由于企业所有制的差异,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目标、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Cuervo-Cazurra et al., 2014)。学界认为国企是政府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主体及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其国际化目标更加多元化 (Buckley et al., 2018)。比较而言, 民营企业国际化更加注重经济绩效目标的实现, 更加体现市场机会的导向。那么,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 民营企业国际化在动因、战略及绩效等方面是否与国企存在差异?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其他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政策如何塑造了这种差异? 第三, 中国各个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区域内企业国际化的观念与战略 (Zhou et al., 2014)。那么, “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不同区域内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是否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可以进一步深化区域异质性特征对国家层面的政策与区域内企业国际化战略关系的理解, 从而有助于推进母国制度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 (Cuervo-Cazurra et al., 2018)。

<sup>①</sup> 虽然近年一些国际期刊出版或计划出版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专刊, 如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19), *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 (20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也立项了多项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 但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相关的主题很少。这一方面表明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 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 需要进一步关注。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醒我们关注这一点。

其次，作为一项新的综合性的国际化促进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与现有的促进企业国际化的政策之间是否产生了相互补充的政策合力？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第一，需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中国企业国际化促进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对于已经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而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战略会受到多重政策的叠加影响，这种叠加影响是否一定形成了合力，为中国企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经营环境？即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外东道国的战略及其结果是否存在差异？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济绩效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内外的东道国存在重要差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未出现积极的政策叠加效应，政府支持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被削弱了（Huang et al., 2020）。这表明需要“解构”中国政府的国际化促进政策，深入地探讨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国内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第二，需要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非正式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都是制度理论中富有争议的一个话题（Kostova et al., 2020），它们的相互作用必然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对于非正式制度要素，我们将主要关注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详细展开论述。

## 2. 关注中国国内区域之间制度差异的影响

正如 Marano 等（2017）所指出的那样，跨

国公司母国的制度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系统，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母国制度对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绩效的影响，必须对多层面、复杂的制度环境进行“解构”，关注不同的制度要素的影响。如果跨国公司母国正式制度的发展是比较均衡的，即在国内不同区域的发展不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按照上述思路深入制度框架的内部，关注更为具体的制度要素（如政治风险、法律的有效性等）的影响即可加深我们对母国制度在影响与塑造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结果等方面理论机制的理解。但如果母国各个区域之间制度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或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为了更好地获得对制度要素影响的理解，就有必要对制度的影响在空间上进行“解构”与比较（Peng & Lebedev, 2017）。显然，作为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制度发展水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樊纲等，2003），而这些差异对区域内企业国际化战略产生的影响则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区域之间存在的上述差异，首先会通过影响企业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其国际化战略。一方面，制度发展的差异会影响区域内企业可以获得的来自政府支持的程度与方式，从而使企业在“政府创造的优势”上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其国际化战略（Cuervo - Cazorra et al., 2018）。另一方面，区域之间在资本与要素市场发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的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以及可获得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樊纲，2003），这些差异显然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

战略。其次，区域之间制度的差异还会通过影响企业经理人的认知过程（Cuervo-Cazurra, 2011），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导向与能力，进而影响其国际化战略（Kirca et al., 2005）。如在高度市场化区域内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意识，相对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区域内的企业更注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塑造，对政府的依赖水平更低（Martin, 2014），而处于对外开放水平更高区域内的企业则比开放水平较低区域内的企业更愿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Sun et al., 2015）。最后，国家层面的政策也可能赋予不同区域在大制度框架内不同的功能，或给予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区域以不同程度的支持，这会使国家层面的政策对各个区域内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前者如在前文讨论过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会直接影响省级政府的政策导向，从而影响区域内的企业国际化战略。后者的影响则更为普遍，如基于中国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国家发展战略，与这些战略相应的是一系列有关的配套政策，而这些政策都会对区域内的企业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为了深化中国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结果影响的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不同区域制度要素的差异纳入研究框架，以深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结果的研究。

## （二）拓展中国文化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

本文关注的中国文化要素主要是指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纽带以及

中国国内区域间文化差异。虽然文化距离范式是解释文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主流范式（Beugelsdijk et al., 2018; Kirkman et al., 2017），但其局限性也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首先，文化距离范式的“静态错觉”（the illusion of stability）是对该范式最重要的质疑之一（Shenkar, 2001），国家文化以及国家之间文化的差异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距离范式在既定的时间截面上无法反映这种变化。其次，文化距离范式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解释机制侧重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的差异，而对母国或东道国文化的影响缺乏关注（López-Duarte et al., 2016）。最后，与前一点相关，文化距离范式缺乏对国内区域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关注。鉴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内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加强对中国文化在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中作用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我们围绕中国文化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提出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供未来的研究参考。

### 1. 关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

虽然导致文化距离变化的因素多元且复杂，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显然是一个可以直接影响两国间文化距离的重要因素（Doney et al., 1998）。与之相应，母国有意识、有计划地将自己的文化向东道国传播，显然会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也会影响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国际化战略与绩效，乃至其东道国合作者的经营行为。虽然文化的海外传播实践已经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如法国建立于1883年的 Alliance Française，英国建立于1934年的 British Council，德国建立于1951年的

Goethe Institut 等，但企业国际化研究却几乎忽略了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尚未建立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理论关联。从企业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母国政府有计划地将文化向东道国的传播可被视为一种缩小文化差距的战略（culture distance bridging strategy）。企业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必须克服与制度和文化差异有关的外来者劣势，才能获得合法性，从而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Kostova et al., 2008）。基于此，母国文化在东道国的传播及其与东道国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有效整合，将有助于在东道国从制度与文化两个路径对母国企业战略产生影响。一方面，母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能够缩小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通过促进宏观层面的文化沟通和信任为母国企业创造更加有利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母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有助于减弱东道国对母国制度的刻板印象，从而有助于减弱母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进而有助于企业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陈岩等，2014；Ghosh et al., 2017）。

中国政府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向国际传播中国文化，现有研究已表明孔子学院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Lien et al., 2012；Ghosh et al., 2017）、来华旅游客流（Lien et al., 2014）及孔子学院所在国对中国的贸易往来（Quer et al., 2012），产生了沟通两国间文化差异桥梁、促进相互理解和经济合作的作用。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一方面，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孔子学院仅是众多文化传播主体中的一个，需加强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目标、价值理念、主体、媒介与内容等要素的研究，并建立其与

中国企业国际化之间的理论关联。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未能深入企业战略层面来解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制，这恰恰是未来研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关注以下问题：第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及其结果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中国正式制度与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中国文化在东道国的传播，无疑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从而减少由于文化与制度差异带来的压力。那么，在东道国制度一定的情况下，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的东道国选择战略？是否会影中国企业文化海外传播对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战略方式？在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之后，中国文化在不同东道国的传播水平与状态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战略（如建立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建立高效的治理机制等）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在东道国的传播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绩效？第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国国内制度要素相互作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及其结果产生了什么影响？虽然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助于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从正式制度与文化两个路径建构更为有利的经营环境，但如果我们同时考虑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中国国内对企业国际化的支持性政策，两者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否产生了合力？抑或是可能产生相互削弱的作用？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在感知到中国企业背后的母国政

策支持的同时,在当地感受到的中国文化传播,是否一定有利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实施国际化战略并提升绩效?第三,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东道国制度要素相互作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及其结果的影响。如果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利于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增进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了解与认同,从而削弱它们对中国企业的刻板印象,那么中国文化的这种作用在不同制度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是否会产生相同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制度发展水平低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在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中形成的独特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其在东道国的经营战略提供强大支持,使之拥有新兴经济体国家企业独有的所有权优势(Cuervo-Cazurra et al., 2018),那么中国文化在这类东道国的传播会放大还是会削弱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之相应,在制度高度发达的东道国,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在这类东道国丧失,那么中国文化在这类东道国的传播能否弥补中国企业这种所有权优势的丧失?文化的传播会对中国企业的经营战略及其结果带来积极的作用还是会进一步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实施的“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战略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研究情境,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也有助于深化与拓展企业国际化理论。

## 2. 关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纽带的影响

Buckley等(2007)指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华人社会的关系(guanxi)网络赋予了中国跨国公司一种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和交易成本,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识别国际市场机会,

并加速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基于这种观点,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华裔人口数量与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也得到了Quer等(2012)的证实。上述观点和研究发现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是影响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文化因素。我们认为东道国华裔人口数量作为文化纽带的代理变量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早期阶段,即海外中资机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部分解释,但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除了华裔侨民所代表的文化纽带之外,新的文化纽带的作用值得在未来研究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和人员进入东道国,从而在特定的东道国正在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华人社会网络。区别于移居海外的华裔侨民,构成这一新网络的华人更多是在海外投资寻找市场机会(民营企业代表性更强),或者只是作为中资机构员工在海外工作(国有企业代表性更强)。一方面,在特定东道国形成的华人网络与中资机构(企业)社群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经营提供支持的社会网络,那么这一网络的规模与结构,以及特定中国企业与这一网络的联系、在网络中的位置无疑都会对中国企业选择进入该东道国,以及进入方式、进入后经营等战略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这一中资机构(企业)社群也可能呈现出某种与国内地域关联的地缘特征,这种特征在民营企业的海外网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来自浙江温州、广西的企业在欧洲和非洲某一国家的集聚。这种基于中国传统地缘文化的社会网络构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文化纽

带，基于地缘的海外社会网络显然会直接影响来自国内特定地域的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之相关，来自中国不同地域的企业在海外集聚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之间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互动（协作或相互排斥），不同的互动方式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显然，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机制。

### 3. 关注中国国内区域间文化差异的影响

相对于关注区域之间正式制度差异对国际化战略与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而言，关注区域间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文化要素影响的文献还非常少（Lu et al., 2018）。然而，相对于正式制度的差异而言，区域之间的差异更多是根植于以文化为主要形式的非正式制度中（Bruton et al., 2009）。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国家，各区域间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建设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即使不考虑少数民族地区亚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南北方、东西部间文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文化是决定人们思想与行为的集体性的思维程序（collective programming），正是这种集体性思维程序使不同群体的人们相互区别（Hofstede, 1980）。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区域文化无疑会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和绩效。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了中国区域间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与绩效的影响，如Lu等（2018）发现中国区域之间社会信任直接影响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夏春玉等（2020）发现企业间私人关系对企业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受到不同水平的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区域

内存在显著差异。但区域间文化的差异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将这个问题与前文讨论的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基于地缘的社会网络的影响结合起来，显然会深化对文化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作用的理解。

### （三）加强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治理战略的研究

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后，只有有效地建立与东道国政府与企业合作伙伴的相互信任，获得合法性，进而有效地建立符合当地正式制度与文化规范的合作关系治理机制，有效地处理合作过程中的分歧与冲突，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国际化企业的“走出去”和“留得住”问题（Ertug et al., 2013; Zaheer & Zaheer, 2006）。合作关系的治理战略是企业用来处理建立、维护，甚至结束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关系而设计的制度机制（Heide, 1994），有效的治理战略会对合作关系的全生命周期过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有效降低合作关系中的交易成本，提升合作关系绩效。全国工商联针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民营企业的一项调查表明，如何建立当地合作企业高效、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受访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而有40.6%的受访企业表示亟须针对东道国法律法规，尤其是劳动仲裁等方面的培训，有37.4%的企业表示需要加大与国内政府部门和东道国政府的沟通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零点有数，2019）。这表明非市场因素（如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制、法律等）是中国国际化企业在进入东道国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与非市场因素所对应的非市场战略是指企业通过管理市场竞争的制度或社会环境来提高

其绩效的行动模式 (Baron, 1995)。企业的非市场战略靠“合法性机制”主导 (谢佩洪等, 2010), 通过采取与非市场因素相符的行动来处理制度矛盾以提高其合法性, 并从主要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关键资源 (Mellahi et al., 2016), 有助于企业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Baron, 1995)。非市场战略相关研究对企业如何与外部环境进行战略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Holburn & Bergh, 2014), 面对制度压力, 企业并不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 而是主动采取相关战略应对。由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在较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部门等非市场参与者制定的, 直接影响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结果, 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企业, 其所在区域相关的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因而非市场战略可能比市场战略更为重要 (Mbalyohere & Lawton, 2018; Peng, 2003)。鉴于此, 我们在呼吁学界对中国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和“留得住”问题研究中将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战略结合, 探讨两者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的同时, 参照学界对非市场战略范畴的划分方法 (Du et al., 2019; Mellahi et al., 2016), 重点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政治战略的研究内容展开讨论, 以启发后续的研究。

### 1.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无论动机如何, 企业能够促进社会利益、提高组织绩效的一种行为 (McWilliams et al., 2006), 是非市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正式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 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受来源国劣势和外来者劣势影响, 合法性问题较为突出 (Bonaglia et al., 2007; Luo & Tung, 2007), 较难与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关系。企业通过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 一方面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交流机制, 向利益相关者释放企业增进社会福利、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社会价值规范保持一致的信息来获得在东道国经营的合法性 (杜晓君等, 2015);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企业在东道国的品牌形象和声誉 (McWilliams & Siegel, 2001), 为建立并维持企业在东道国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最终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对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的社会责任问题展开探讨。例如, 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其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治理产生了何种影响? 母国与东道国在制度、文化和地理上的距离是否会 (通过何种机制) 影响中国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得合法性和关系治理的效果?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实践是否存在差异?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可以弥补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对进入后合作关系治理关注的不足,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更加完整的理论框架。

### 2. 企业政治战略

企业政治战略是企业为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外部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的一种策略或行动 (Tian & Deng, 2007)。制度理论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 企业通过运用政治战略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可得到政府的保护或免除麻烦 (谢佩洪等, 2010), 克服政治风险 (Puck et al., 2013), 是企业获取合法性的主要途径 (熊会兵等, 2010)。现有研究从母国制度层面证实了中国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有助于其合法性的获得 (Zhou et al., 2007; Zhang et al., 2016), 但对中国企业在进入东道

国之后的经营活动中与东道国官员、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等的关系处理问题，现有研究却未给予关注。受来源国劣势的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在一些国家遭受了较多的审查和限制。由于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不允许企业采用西方国家传统的政治战略（如结构化的游说体系和竞选捐款）（Du et al., 2019），使中国企业缺乏与东道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因此，在成功进入东道国后，如何同当地利益相关者交往并进行合作关系治理对中国企业来说显得更为棘手和迫切。那么，中国国际化企业如何通过政治战略处理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何时选择顺应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要求获得合法性？何时选择通过制度创新将母国的政治战略应用到东道国市场，创造竞争优势？企业的政治战略选择对合作双方的关系绩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给予关注。

#### （四）强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结果的研究

经济绩效并非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唯一目标（Luo & Tung, 2007; Morck et al., 2008），因而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非经济结果（如国有/非国有企业目标、企业社会绩效），并重点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具体研究内容进行论述，以促进学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结果的研究。

企业社会绩效是指一个商业组织对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响应过程以及与企业社会关系相关的政策、纲领和可观测结果的架构（Wood, 1991）。社会绩效水平高的企业可能面临较少的劳动诉讼案件，通过捐赠获得社区的认可，以更高质量的产品保持客户的忠诚度，并通过更好

的劳动关系提升员工士气（Cho & Lee, 2019），以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陈维政等，2002）。虽然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社会绩效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性（Margolis & Walsh, 2003），但当前学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社会绩效的关注严重不足。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对企业社会绩效产生了何种影响？母国与东道国的正式制度和距离是否会影响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社会绩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国际化企业的社会绩效水平？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助于深化企业国际化结果的理解。

#### （五）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 1. 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佟家栋等，2017），这给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内外部环境都带来了重要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暴发，不仅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并且与反对全球化的“逆全球化”相互叠加，使全球化趋势受到严重影响。Witt（2019）指出，逆全球化将对国际商务中的企业战略、结构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可能会带来企业国际化战略质的变化。那么，面对逆全球化趋势，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尤其是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效地规避上述威胁与风险、捕捉发展机会？这显然是兼具现实和理论意义的重大问题。

## 2. 新技术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给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众多机遇（汪阳洁等，2020）。疫情期间我国远程办公、远程诊疗、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等网络消费和无人配送、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潜力（何诚颖等，2020）。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5G、机器人、AI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的资源配置、组织结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商务管理的理论假设可能遭遇较大挑战，例如，数字化技术增强了跨国企业技术型特定资产的跨境可转让性，通过数字化平台，企业也能够以较低成本在外国市场开发先进人力资本，要素市场的可流动性被大大提高（Banalieva & Dhanaraj, 2019）。这挑战了资源基础观关于要素市场是不完全流动的，能够获取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不可被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假设，传统理论中的企业特定竞争优势的来源可能发生改变。此外，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出现和快速国际化也对传统国际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平台型企业对特定优势的开发遵循外部化逻辑（Chen et al., 2019），为促进平台技术的传播，企业可以与合作伙伴共享或放弃访问与传播平台技术的权利。而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克服外来负债的能力源于其对无形资产的所有权，这使它们的特定优势无法供东道国的竞争对手使用（并因此建立了隔离机制）。平台型企业所具有的特点超出了现有内部化理论和企业特定优势的传统理

解的范围（Li et al., 2019）。那么，新技术环境下，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理论相关性是否受到了挑战？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路径与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环境，数字化平台如何规避政治封锁、促进中国企业重构全球价值链？在未来的研究中这将会成为一个被日益关注的研究方向。

为更加清晰地展示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本文将上述内容以表格的形式展现（见表2）。

表2 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问题
1. 深化中国国内正式制度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	· 关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关注中国国内区域之间制度差异的影响
2. 拓展中国文化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影响的研究	· 关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
	· 关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纽带的影响
	· 关注中国国内区域间文化差异的影响
3. 加强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治理战略的研究	· 企业社会责任
	· 企业政治战略
4. 强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结果的研究	· 社会绩效
5. 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 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 新技术环境下的中国企业国际化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内容整理。

## 五、结论

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现状，识别研究不足与机会，本文采用“国际化动因—战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对2001年至2019年5月的310篇中英文文献进行了梳理。文献综述的结果表明，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文献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围绕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动因、战略、结果等研究主题，研究正在走向纵深。但现有研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为对中国国内正式制度与文化的作用、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的治理战略选择，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多元化目标等方面。本文结合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围绕中国国内正式制度与文化要素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分析框架，并指出了若干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相较于现有综述性研究文献而言，聚焦中国企业国际化，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的英文和中文文献，全面、系统地展现了有关中国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理论进展，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路线图。第二，以正式制度与文化两个要素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主要围绕中国正式制度与文化要素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展开论述，重点阐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纽带、中国国内区域之间正式制度和差异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为学者们进一步推进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研究建议。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点不足和局限：第一，我们采用国际化动因—战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对该主题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评价，虽然这一分析框架是广为学界接受的，但我们未能提出一个系统、完整的全新理论框架，这是未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我们仅针对现有文献的研究问题进行了综述，而对现有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重要主题没有关注，这也有待未来的综述研究予以关注。第三，虽然我们对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而严谨的检索，但仍然可能遗漏重要研究文献。

接受编辑：马旭飞

收稿日期：2020年1月10日

接受日期：2021年4月12日

作者简介：

马田园，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商务、营销渠道行为理论，在《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期刊发表论文。

张闯（通讯作者，zhangchuang@dufe.edu.cn），管理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营销战略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以及《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

## 参考文献

- [1] 陈怀超、范建红、牛冲槐:《制度距离对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研究——国际经验和资本调节效应》,《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4期。
- [2] 陈立敏、刘静雅、张世蕾:《模仿同构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正当性视角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 [3] 陈维政、吴继红、任佩瑜:《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7期。
- [4] 陈岩、翟瑞瑞、郭牛森:《基于多元距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1期。
- [5] 董临萍、宋渊洋:《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绩效:权力与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管理评论》,2017年第8期。
- [6] 杜晓君、杨勃、任晴阳:《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边界跨越策略研究》,《管理科学》,2015年第2期。
- [7] 樊纲、王小鲁、张立文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 [8] 方慧、赵甜:《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管理世界》,2017年第7期。
- [9] 何诚颖、闻岳春、常雅丽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测度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 [10] 黄胜、叶广宇、申素琴:《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述评——制度理论的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年第4期。
- [11] 贾镜渝、李文:《距离、战略动机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基于制度和跳板理论》,《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6期。
- [12] 蒋冠宏:《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
- [13] 李梅、卢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经济管理》,2019年第1期。
- [14] 李梅、余天骄:《海外研发投资与母公司创新绩效——基于企业资源和国际化经验的调节作用》,《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 [15] 李诗、吴超鹏:《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政治和文化视角》,《南开管理评论》,2016年第3期。
- [16] 林莎、雷井生、杨航:《中国企业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差异性研究——来自223家国内企业的经验分析》,《管理评论》,2014年第9期。
- [17] 零点有数:《“一带一路”沿线中国民营企业现状调查报告》, <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1912/201912060530002.pdf>, 2019年12月6日。
- [18] 任晓燕、杨水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预测》,2016年第3期。
- [19] 商务部:《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010/20201029172027652.pdf>, 访问日期:2020年9月27日。
- [20] 佟家栋、谢丹阳、包群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
- [21] 汪阳洁、唐湘博、陈晓红:《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机遇及应对策略》,《科研管理》,2020年第6期。
- [22] 吴冰、阎海峰、杜子琳:《外来者劣势:理论拓展与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6期。

- [23] 吴先明、胡翠平：《国际化动因、制度环境与区位选择：后发企业视角》，《经济管理》，2015年第5期。
- [24] 吴晓波、周浩军：《国际化战略、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科学学研究》，2011年第9期。
- [25] 夏春玉、张志坤、张闯：《私人关系对投机行为的抑制作用何时更有效？——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伦理格局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 [26] 谢佩洪、何晓光、阎海燕：《企业非市场战略理论体系及其内在主导机制研究》，《管理学报》，2010年第2期。
- [27] 熊会兵、肖文韬、邓新明：《企业政治战略与经济绩效：基于合法性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
- [28] 许晖、万益迁、裴德贵：《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风险感知与防范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管理世界》，2008年第4期。
- [29] 许晖、邹慧敏：《企业的国际化感知风险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研究》，《管理科学》，2010年第2期。
- [30] 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 [31] 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
- [32] 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 [33] Alon, I., Anderson, J., & Munim, Z. 2018. A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573-605.
- [34] Banalieva, E. R., & Dhanaraj, C. 2019.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 1372-1387.
- [35] Baron, D. P. 1995. Integrated strategy: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7: 47-65.
- [36] Bausch, A., & Krist, M. 2007. The effect of context-related moderator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Evidence from meta-analysi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47: 319-347.
- [37] Beugelsdijk, S., Kostova, T., Kunst, V. E., Spadafora, E., & Van Essen, M. 2018. Cultural distance and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44: 89-130.
- [38] Bonaglia, F., Goldstein, A., & Mathews, J. 2007.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emerging markets' multinationals: The case of the white goods sector.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2: 369-383.
- [39] Brouthers, K. D., & Hennart, J. 2007. Boundaries of the firm: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 395-425.
- [40] Bruton, G. D., Ahlstrom, D., & Puky, T. 2009.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A comparison of the venture capital indus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0: 762-778.
- [41] Buckley, P., Clegg, L., & Adam, A.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49-518.
- [42] Buckley, P. J., Clegg, J., & Wang, C. 2002. The impact of inward FDI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3: 637-655.
- [43] Buckley, P. J., Clegg, L. J., & Voss, H. 2018. A retrospective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hi-

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4–23.

[44] Buckley, P. J., Cross, A. R., & Tan, H. 2008. Historic and emergent trends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48: 715–748.

[45] Chen, L., Shaheer, N., Yi, J., & Li, S. 2019. The international penetration of ibusiness firms: Network effects, liabilities of outsidership and country clo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 172–192.

[46] Child, J., & Rodrigues, S. B. 2005.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 381–410.

[47] Cho, S. Y., & Lee, C. 2019. Managerial efficiency,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8: 467–486.

[48] Cuervo-Cazurra, A. 2012. Extending theory by analyzing developing countr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olving the Goldilocks debate.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 153–167.

[49] Cuervo-Cazurra, A., Inkpen, A., & Musacchio, A. 2014. Governments as owners: State-owne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919–942.

[50] Cuervo-Cazurra, A., Luo, Y., & Ramamurti, R. 2018. The Impact of the home country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3: 593–604.

[51] Cuervo-Cazurra, A. 2011. Selecting the country in which to start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non-sequential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6: 426–437.

[52] Cui, L., & Jiang, F. 2010. Behind ownership decision of Chinese outward FDI: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7: 751–774.

[53] Cui, L., & Jiang, F. 2009. FDI entry mode choice of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behavio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4: 434–444.

[54] Cui, L., & Jiang, F. 2012. State ownership effect on firms' FDI ownership decisions und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 study of Chinese outward-investing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 264–284.

[55] De Beule, F., Somers, D., & Zhang, H. 2018. Who follows whom? A location study of Chinese private and state-owned compan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8: 43–84.

[56] Deng, P. 2013.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research: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9: 513–539.

[57] Deng, P. 2004. 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Business Horizons*, 47: 8–16.

[58] Deng, P. 2012.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ritical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14: 408–427.

[59] Deng, P. 2009.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4: 74–84.

[60] Dikova, D., & Van Witteloostuijn, A. 200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de choice: Entry and establishment mod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1013–1033.

[61] Doney, P. M., & Mullen, C. M. R. 1998.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 601–620.

[62] Du, J., Bai, T., & Chen, S. 2019. Integrating corporate social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ie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ie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8: 299–316.

[63] Dunning, J. 1981.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17: 30–64.

[64] Dunning, J. H. 1998.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9 (1): 45–66.

[65] Dunning, J. H. 2001.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8: 173–190.

[66] Ertug, G., & Cuypers, I. R. P. 2013. Trust betwee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partners: Effects of h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4: 263–282.

[67] Gao, L., Liu, X., & Zou, H. 2013. The role of human mobility in promoting Chinese outward FDI: A neglected fact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2: 437–449.

[68] Ghosh, S., Lien, D., & Yamarik, S. 2017. Does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network impact cultural distance?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cross-border flows in and out of China. *Asian Economic Journal*, 31: 299–323.

[69] Haasis, T. I., & Liefner, I. 2019.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14: 24–50.

[70] Heide, J. B. 1994. 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n marketing channels. *Journal of Marketing*, 58: 71–85.

[71] Hernandez, Exequiel, Mauro, F., & Guillén. 2018. What's theoretically novel about emerging-market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24–33.

[72] Hitt, M. A., Hoskisson, R. E., & Kim, H.  
— 174 —

1997.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product-diversified fir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 767–798.

[73]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74] Holburn, G. L., & Bergh, R. G. V. 2014. Integrated market and nonmarket strategies: Politic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round merger and acquisition events in the energy secto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450–460.

[75] Huang, Y., Shen, L., & Zhang, C. 2020. Home-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foreig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owned subsidiari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27.

[76] Huang, Y., Xie, E., & Li, Y. 2017. Does state ownership facilitate outward FDI of Chinese SOE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logic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SO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6: 176–188.

[77] Jormanainen, I., & Koveshnikov, A. 2012.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52: 691–725.

[78] Kandogan, Y., & Hiller, J. 2018. Alliances in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forma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region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729–742

[79] Kang, Y., & Jiang, F. 2012.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45–53.

[80] Kirca, A. H., Jayachandran, S., & Bearden, W. O. 2005. Market orientation: 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its antecedents and impact on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69: 24–41.

- [81] Kirkman, B. L., Lowe, K. B., & Gibson, C. B. 2017. A retrospective on Culture's Consequences: The 35-year journ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12-29.
- [82] Kostova, T., Beugelsdijk, S., & Scott, W. R. 2020. The constru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Review,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1: 467-497.
- [83] Kostova, T., Roth, K., & Dacin, M. T. 2008.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 critique and new direc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994-1006.
- [84] Lien, D., & Co, C. Y. 2013. The effec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US Exports to China: A state leve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7: 566-571.
- [85] Lien, D., Oh, C. H., & Selmier, W., T. 2012. Confucius institu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and FDI: Isn't it delightful when folks afar study Hanyu?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1: 147-155.
- [86] Lien, D., Yao, F., Zhang, F. 2017. Confucius Institute's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China: Do cultural difference or institutional quality matter? *Applied Economics*, 49: 3669-3683.
- [87] Li, H., Yi, X., & Cui, G. 2017. Emerging market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 do firms' inward activities affect their outward activ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8: 2704-2725.
- [88] Li, J., Chen, L., & Yi, J. 2019. Ecosystem-specific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digital commer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 1448-1463.
- [89] Li, J., Li, P., & Wang, B. 2016. Do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create value? Evidence from overseas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 471-483.
- [90] Li, J., Liu, B., & Qian, G. 201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friction and ethnicity: Their effect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SMEs in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4: 350-359.
- [91] Li, J., Li, Y., & Shapiro, D. 2012. Knowledge seeking and outward FDI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ward FDI.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 277-295.
- [92] Lin, X. 2010. State versus private MNCs from China: Initial conceptualization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7: 366-380.
- [93] Liu, X., Buck, T., & Shu, C. 2005.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xt stage: Outward FD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4: 97-115.
- [94] Liu, Y., & Yu, Y. 2018. Institutions, firm resources and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mode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om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93: 111-121.
- [95] López-Duarte, C., González-Loureiro, M., & Vidal-Suárez, M. 2016.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national culture: Mapping the field and developing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1: 511-524.
- [96] Lu, J., Liu, X., & Wright, M. 2014.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5: 428-449.
- [97] Lu, J., Ma, X., & Taksa, L. 2017. From LLL to IOL 3: Moving dragon multinationals research forward.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 757-768.
- [98] Lu, J. W., Song, Y., & Shan, M. 2018. Social trust in subnational regions and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9: 761-773.

- [99] Luo, Y., & Tung, R., L. 2007.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481–498.
- [100] Luo, Y., Xue, Q., & Han, B. 2010. How emerging market governments promote outward FDI: Experi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5: 68–79.
- [101] Luo, Y., Zhang, H., & Bu, J. 2019. Developed country MNEs investing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Progress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35.
- [102] Luo, Y., & Zhang, H. 2016. Emerging market MNEs: Qualitativ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2: 333–350.
- [103] Marano, V., Tashman, P., & Kostova, T. 2017. Escaping the iron cage: Liabilities of origin and CSR reporting of emerging marke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386–408.
- [104] Margolis, J. D., & Walsh, J. P. 2003. Misery loves companies: Rethinking social initiatives by busi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268–305.
- [105] Martin, X. 2014.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4: 55–69.
- [106] Mathews, J. A. 2006.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5–27.
- [107] Mbalyohere, C., & Lawton, T. C. 2018. Engaging stakeholders through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 Insights from MNE nonmarket strategy in an emerging African mark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4: 369–385.
- [108] McWilliams, A., & Siegel, D. 2001.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eory of the firm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117–127.
- [109] McWilliams, A., Siegel, D. S., & Wright, P. M. 2006.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3: 1–18.
- [110] Melin, L. 1992.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 strategy proces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 99–118.
- [111] Mellahi, K., Frynas, J. G., & Sun, P. 2016. A review of the nonmarket strategy literature: Toward a multi-theoretic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42: 143–173.
- [112] Moreck, R., Yeung, B., & Zhao, M. 2008.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337–350.
- [113] Narula, R. 2012. Do we need different frameworks to explain infant MN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 188–204.
- [114]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5] Peng, M. W. 2003.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8: 275–296.
- [116] Peng, M. W., & Lebedev, S. 2017. Intra-national business (IB)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 241–245.
- [117] Peng, M. W. 2002. Toward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 251–267.
- [118] Puck, J. F., Rogers, H., & Mohr, A. T. 2013. Flying under the radar: Foreign firm visibility and the efficacy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2: 1021–1033.
- [119] Quer, D., Claver, E., & Rienda, L. 2012.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st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 1089–1104.

- [120] Reed, R., Lira, C., & Byung-Ki, L. 2016.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ole of endogeneity and dynamic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83: 176-201.
- [121] Rugman, A. M., Nguyen, Q. T., & Wei, Z. 2016. Rethink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 269-302.
- [122] Rui, H., & Yip, G. 2008. Foreign acquisitions by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inten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3: 213-226.
- [123] Shenkar, O. 2001. Cultural distance revisited: Towards a more rigorou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2: 519-535.
- [124] Sun, S. L., Peng, M. W., & Lee, R. P. 2015. Institutional open access at home and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0: 234-246.
- [125] Tian, Z., & Deng, X.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 in Chinese transition.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7: 341-356.
- [126] Van Hoorn, A., & Maseland, R. 2016. How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effects vs institutional profile eff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7: 374-381.
- [127] Wang, C., Hong, J., & Kafouros, M. 2012.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1: 425-438.
- [128] Wang, C., Hong, J., Kafouros, M., & Wright, M. 2012. Explorin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outward FDI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3: 655-676.
- [129] Wei, Z. Y. 2010. The literature on Chinese outward FDI.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8: 73-112.
- [130] Witt, M. A. 2019. De-globalization: Theories, predic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 1053-1077.
- [131] Wood, D. J. 1991.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revisit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691-718.
- [132] Wu, A., & Voss, H. 2015. When does absorptive capacity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of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4: 344-351.
- [133] Wu, J., Wang, C., & Hong, J. 201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51: 251-263.
- [134] Xia, J., Ma, X., & Lu, J. W. 2014.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resource dependence log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1343-1363.
- [135] Yang, X., Jiang, Y., & Kang, R. 2009.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ir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 141-162.
- [136] Zaheer, S., & Zaheer, A. 2006. Trust across bord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 21-29.
- [137] Zhang, X., Ma, X., & Wang, Y. 2016. What driv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MEs? The joint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ties, and firm ownersh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 522-534.
- [138] Zhang, Y. A., Li, Y., & Li, H. 2014. FDI spillovers over time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s of entry tenure and barriers to imit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698-722.

[139] Zhang, Y., Li, H., Li, Y., & Zhou, L. A. 2010.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 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1: 969–989.

[140] Zhong, W., Peng, J., & Liu, C. 2013.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developed marke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 2479–2484.

[141] Zhou, L., & Wu, A. 2014. Earlin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Explo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venture age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9: 132–142.

[142] Zhou, L., Wu, W. P., & Luo, X. 2007.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born-global S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 673–690.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Tianyuan Ma Chuang Zhang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attracted growing interest from scholars in multiple fields. Extant studies in this field are at the early stage and conducted on a piecemeal basis. With an ai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CE and promote the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ynthesized the current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and the diverse empirical findings.

The paper determined the scope of journals and collected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methodologies. For English literature, the top journals in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elds were firstly selected, supplemented by others in the previous similar studies. Then, we searched the EBSCO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database for academic articles containing the term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greenfield investment, outbound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o 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 we searched the CNKI database for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CSSCI journals with the same terms. As a result, a total of 310 articl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in the review framewor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 deeper way, the paper respectively reviewed the motiv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outcomes of ICE. The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was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searchers conducted corresponding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natural resource seeking, market seeking, efficiency seeking, strategic assets seeking and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

Second, the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companies from location selection, entry mode, establish mode, 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research on th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location selectio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host country'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risks, cultural distance and enterprise-level characteristics. The host country entry mode strategy mainly includes joint venture and wholly-owned entry. The host country establish mode strategy is related to the entry mode of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mainly includes two strategies: M&A and greenfield inves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was the most popular topic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Unfortunate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not reached a consisten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attention to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es on non-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were insufficient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Finally,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s growing rapidly. The paper constructed a logical framework, and propos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f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the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bonds between China and host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domestic re-

## Contents

g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outcome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paper expected future research on these directions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research.

**Key Words:** China;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literature review